

楔子

1935年夏秋之交,京州的形势严峻起来,省委书记兼军工委书记刘必诚落入敌手,旋即判了死刑。党组织指示我紧急营救。我为筹措营救资金,被迫将自家祖屋廉价卖给了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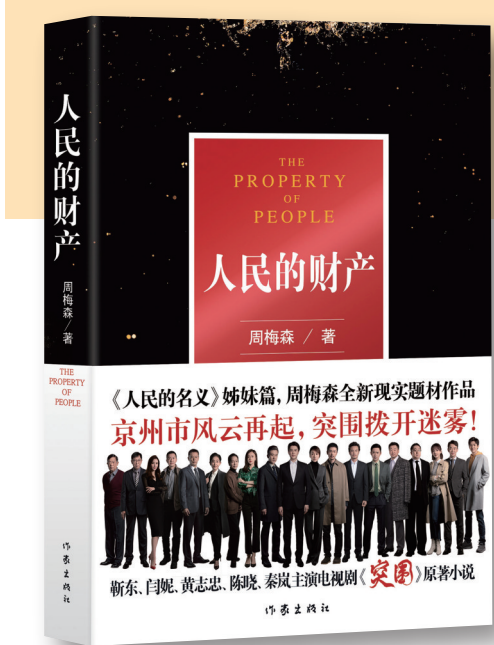
我忘不了那个夜晚。大雨倾盆,霹雳滚滚,连续不断,像一颗颗炸弹在头顶上炸响。买家怕我反悔,催我连夜交割。他五根金条买下我五间正屋、六间厢房,还有偌大一个院子,不到市价的一半。我急需救命钱,当即交出房契,揣上金条,匆匆告别了祖上留下的房产。

院门口有一株古槐,也不知多少年份了,树冠如巨伞,荫蔽半条街。当我在暴雨中回望祖屋最后一眼时,一个火星落下,竟生生地劈断了碗口粗的一根枝干!我一个激灵,急忙登上阿宝的黄包车。

阿宝是地下交通站成员,他拉着我一路飞奔来到李乔治家。李乔治见面就埋怨,说是执法处处长刚才电话,话讲得很绝,救人要趁早,过时不候,而且定金不退!我忙把五根金条从怀里掏了出来,塞到他手里,催他快走。阿宝又拉着黄包车,把李乔治送往陈处长家。

这五根金条是陈处长突然加价,逼着我拿出来的。原来讲好五根金条换人,李乔治已经送给他了。可他撬开一个叛徒的嘴巴,得知刘必诚是共产党人,立马翻倍要十根金条,此前送上的五根金条就成了所谓定金!这就有了我夜卖祖屋的一幕。和现在年轻人的想象不同,共产党人落在国民党手中也不一定个个牺牲,其中还是有操作空间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员腐朽堕落,贪赃枉法,把空间留下了。为营救同志,我们地下党组织总是不惜代价、千方百计地筹钱捞人。这就催生了李乔治这样的政治痞客。

说起李乔治这个人,在当时的京州可是鼎鼎有名。他什么生意都做,什么人都认识。尤为令人惊叹的是他与政界、军队的关系,他虽登不了人家的大雅之堂,但总能七拐弯八抹角地从后门钻进去。他的敲门砖就是金钱。用今天的话来



■书摘

这时我哪能离开京州啊,李乔治揣着我给他的这五根金条跑路了,刘必诚生死未卜,我一定要找到李乔治,问清情况,再想办法!

李乔治家不敢待了,我就一次一次到一个名叫“老地方”的茶楼找他,那是我往日和他接头之处。过了八天,李乔治拿了一份《扫荡报》晃悠悠悠来到我的茶桌旁坐下了。最危险的时刻过去了,他显得坦然放松。在我急促催问下,他把那夜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

问题出在刘定国身上。这位行刑队长可能因分赃不均,或者他本来就是卧底的蓝衣社特务,向警备司令部告了密。陈处长被捕,被连夜抄家。刘必诚都坐着货车到监狱大门口了,功亏一篑,被等在门岗的军警抓获。黎明时分,刘必诚被执行枪决,面对初起的曙光英勇就义。

陈处长也被枪毙了。他家小楼藏着大量美钞、珠宝,警备司令部孙司令本可以捞一票大实惠,可是一幕黑色喜剧上演了。三个负责押送赃物的军警在警车里发起了一场抓宝游戏,面对口袋里金条、钻石、珍珠、美钞,他们垂涎欲滴,商定一人抓一把,都发点小财。可人性的贪婪怎么止得住呢?抓了一把就有第二把、第三把,最后三人一合计,逃了,干脆全分了吧!完分赃,三人跳下警车,分头逃了。

我想起卖祖屋的五根金条,李乔治从包里取出金条归还于我。我拿出一根金条推到他面前,这是当时说好的酬劳。李乔治竟不收,动容地对我说:我不能拿朱先生你卖祖屋的钱啊!国民党的同志们瓜分赃物雨夜奔逃,你朱先生贱卖祖屋救自己的同志,共产党了不起……

我带着失而复得的五根金条到上海向党组织报到,嗣后按照党的领导同志的指示,以这五

《人民的财产》(节选)

□周梅森

根金条做资本,创办了党营工商业上海福记中西货贸易公司,为我党筹措经费。有关领导为福记公司规定了秘密工作原则:不和上海及各地党组织发生联系,做好生意,广交朋友。

公司开在租界摩斯路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令我没想到的是,开张那天李乔治擎着一束鲜花出现在铺子里。他是如何准确地找到这个地方的呢?李乔治神秘地笑道:我上交天上神仙,下结地下小鬼,人世间的事情哪有逃得过我眼睛的?原来,他又和京州新任缉私处长勾搭在一起了,从京州海关搞了一批走俏的西药,要卖给我们福记公司。

开张大吉,我从李乔治手里买了一批消治龙,很快销售一空。有了这个鬼精掬客,加上我在上海本来就有小开的名声,各路关系都很好,上海福记就迅速发展起来。最终成就了今天这个大型国企集团。

历史总有吊诡之处。一个貌似强大的政权,最终溃败于自身的腐烂。而上海福记的诞生发展,竟是踩着国民党的腐败一步步走过来的。我卖祖屋的金条犹如一颗种子,在腐土中生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摘自朱昌平回忆录《上海福记公司始末》

当福集团的领导们突然中断展览审查,匆忙离去时,齐本安并不知道数千里外的京州有福有位叫田园的纪委书记,从十八层楼跃身而下,自杀身亡了!齐本安更不知道,就在那一刻,他的命运改变了……

那是2015年9月初的一天。北京天气晴好,阳光灿烂,雾霾远遁。齐本安情绪饱满地向领导

们汇报布展的准备工作。当年的上海福记从租界内的一个小铺子,成长为今天这个覆盖能源电力、金融地产、商业企业的跨国集团公司,堪称奇迹。按领导安排,展览馆展厅大堂前已经竖起了倒计时牌,提醒人们这一大型国企八十年华诞的临近。

偏在这一天,老婆范家慧进京,让齐本安陷入窘境。老婆天生是大人物,再小的事都能办出大气魄来。给儿子的新老师送个礼,搞点小腐败,也把她张扬得不行,一下飞机就发信息让他速归。他是文宣总监,正忙着,咋归?便眯空回复:正接待领导,等着吧!老婆便打电话,齐本安看一眼来电显示马上按掉。老婆不依不饶,一遍又一遍把电话打进来。齐本安手机揣在怀里,就像揣了一颗危险的炸弹。

董事长林满江巡视展线,独自走在前面,和齐本安及其随从保持半步至一步的距离。领导兴致勃勃,指出问题,发布指示:本安,云南战时展这部分实物不够啊,怎么连一辆四十年代的道奇车都没有?你说老同志朱道奇能答应吗?朱道奇可是生在道奇车上的!

齐本安慌忙回答:哦,林董,我已经安排云南公司的人去找了!

林满江把手指伸在空中画了个圆:给你一个建议,到缅甸去找找看吧,几年前我在仰光谈项目,在仰光街头见到过这种美国老爷车。

这时,齐本安的手机又响了,响得惊心动魄,像炸响爆炸。

林满江拧了齐本安一眼,有些不悦:谁呀?这么不屈不挠的?

(摘自《人民的财产》,周梅森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

一部好小说,多部当代史

——阿莹长篇小说《长安》初论 □李震

作家阿莹以20多年来在军工厂一线的生活体验,数年的工业企业管理经验,数千份军工档案的潜阅读,大量中短篇小说、散文和剧本的写作积累,以及十五六稿的反复修改打磨,熔铸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长安》。这部小说的独特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似乎是浑然天成的。因为作者讲述的既是一块鲜为人知的国之重器的诞生地,又是文学书写的处女地——军工生活,而且塑造出了中国文学画廊中第一组工人群像。这足以让这部小说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并以其独特的内涵占据一席之地。

纵观新中国文学史,长篇小说写作一直以乡村叙事为主导,书写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屈指可数,有影响的仅有《子夜》《火车头》《铁水奔流》《百炼成钢》《上海的早晨》《乘风破浪》《沸腾的群山》等几部。即使是在全面提速工业化进程的改革开放以来,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也仅有《沉重的翅膀》《车间主任》等寥寥几部。在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迄今为止的获奖作品中,仅有《沉重的翅膀》一部涉及到工业题材。而在这些少之又少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中,军工题材的作品一直是空白。

当然,决定《长安》文学价值的,绝不仅仅是其题材,而是其多维度、立体化的历史叙事,唯物史观和现实主义原则,和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多部当代史,以及其所揭示出的历史逻辑的必然性。

一、多维透视中的历史叙事

《长安》以40多万字的篇幅,讲述了从1940年代的末到1970年代末,建于古都长安的共和国第一代军工企业——长安机械厂30年的坎坷历史及其为共和国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为一部小说,《长安》的历史叙事呈现出历史逻辑与文学逻辑的复杂交错和合理兼容,并以多视角立体地、最大限度地逼近了历史的真实和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作为文学作品,《长安》透视历史的视角首先是对人的认识、剖析和表现。就本质而言,人是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交汇点。因为历史是由人的行为构成的,而文学就是人学。所以研究和表现人的言行方式和精神内涵,是文学书写的使命,也是历史书写的使命。从笔者所知晓的这部小说的形成过程来看,阿莹不论是生活中的朋友,还是其深研的无数档案资料,或是写作中墨最多的,都是他所熟悉的一群工人。也正是这群他20多年的同事、可以一谈说粗话的朋友和他最关注的一个社会群体,触动了他写作这部小说。也正是“人”的视角的一以贯之,让他塑造出了中国文学画廊中第一个活灵活现的军工人群像,他写出的历史首先是一部30年来中国军工人的心灵史。

《长安》透视历史的第二个视角是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尽管在小说中没有专门展开对这一关系的讨论,但阿莹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贯穿始终。如何理解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不仅是军工行业存在合理与否的依据所在,也是这部小说的写作伦理所在。阿莹正是从这个维度的思考中提炼出小说的核心主题,也就是我们国家至今坚持的一种理念:只有准备战争,才能避免战争,才

能实现和平。也正是从这个维度的叙事中,阿莹书写出了当代中国前30年的军工史。

《长安》透视历史最根本的一个视角,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对人、对军工行业、对共和国和中华民族历史进行观察与反思。阿莹自己作为军工人、作为一名管理干部,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切、思考和担当,几乎是一种本能和习惯,也是他写作这部小说的根本动力和初衷。小说对每个具体的人、具体事件的叙述,背后都牵扯着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兴衰起伏,国家的每一次潮起潮落都投射到了每一个人物的个人命运之中。正是这种对国家和民族的关切、思考和担当,让阿莹将这部小说写成了共和国前30年的国族史。

作为一部小说,《长安》写作的难度和复杂性,在于如何将这些多维度的视角统一在同一部小说的叙事之中,统一在合理的历史观和文学原则之中,而且还要做到浑然一体、相互推动。这或许是《长安》作为一部好小说的根本所在。

二、第一组军工人群像及其家国同构的心灵史

与阿莹的写作初衷一样,《长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人物。其人物塑造,除了具有作为中国文学画廊中第一组军工人形象的重大意义之外,还在于这组人物精神内涵的复杂性和艺术构成方式的独特性。

1. 社会赋予角色的强大理性与人性深处的非理性构成的张力、冲突与分裂,构成《长安》人物内涵的复杂性

《长安》人物群像的社会角色都是共和国第一代军工人。这一角色赋予《长安》人物的共同理性是:为国家创造安全保障,为人民创造和平生活。每一个长安人的理想、情感、前途、命运,乃至他们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都围绕这一职责和使命展开。正是这一强大的理性塑造了长安人“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勇于奉献”的军工精神。而与这种强大的理性和伟大的军工精神构成张力、冲突与分裂等复杂关系的,则是每个人物人性深处和内心世界中的各种非理性因素,如私欲、私情、嫉妒、贪婪、爱的本能、向美的本能、向善的本能等等。这些正常人都可能拥有的,却又因人而异的,来自人性的非理性因素,与其共同的理性之间形成不同组合,构成了姿态各异的长安人物的复杂内涵和丰富的艺术魅力。小说中军工精神的标志人物忽大年,从战场转战共和国第一代军工厂担任总指挥、厂长,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去拆弹,顶着被批斗、被撤职的危险,忍受牺牲妻子和妹妹等各种痛苦,都要坚持上阵指挥为共和国制造尖端武器。但这样一个崇高的人物,却始终困扰于难以启齿的原因逃婚而被遗弃的女人黑妞儿的纠缠中,困扰于对离散而又重聚,却因自己无力保护而自尽的妹妹小月的自责中,困扰于对忠心耿耿却被迫害致死的妻子靳子的愧疚中,正是这些来自亲情的、爱情的、人性的非理性因素,与其作为脊梁的社会角色的高度理性之间的冲突,让这位小说中的一号人物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担当有业绩、有弱点有缺憾的活生生的军工人形象。

2. 以性格的特异化、极致化、传奇化原则,将

一组人物“羽化”,从而激活了整个小说的灵性。

在《长安》的人物形象中,最出彩的是一组被“羽化”了的人物,包括忽小月、小和尚满仓、技术员连福、黑妞儿,还有那位牺牲在中印边界的小姑娘毛豆豆。这组人物在同样富有军工精神的同时,被赋予了特异性的品质,具有了传奇色彩,从而使其获得了一种让人灵魂出窍般的“羽化”效果。忽小月热情奔放而又天真单纯的极致化,导致了其与污泥浊水的剧烈冲突,竟至自杀身亡;小和尚满仓的向善向美本性的极致化,使他因小月的自杀而再度出家,却在深山修行中仍然为“长安”祈祷;黑妞儿的朴实善良而只认死理的个性被极致化,使得她以传奇的方式,用自己半生的心血追讨她未能圆房的丈夫忽大年,最终为军工事业奋勇献身;被误认为日本特务的东北技术员连福,其才智出众的特殊禀赋与充满心计、私欲和发财梦的复杂内心被极致化,从而造就了他大起大落、颠沛流离的传奇命运;而天真烂漫又英勇无畏的小姑娘毛豆豆,在中印战场牺牲,像一只在战火中飞走的和平鸽,在忽大年和读者的心中留下了一声久久不能消失的鸽哨。

这组人物的书写,不仅成为小说的亮点和痛点,而且激活了整部小说的灵性,使这部执着于书写历史的小说散发出灵性的光芒。

3. 与不同人物个性相吻合的心理描写,打开了人物的心灵世界和人性的深度。

在这部书写军工生产与生活的小说中,心理描写显然是一个不可多得特征。一般来说,军工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题材,小说中涉及了大量重大的历史事件,许多具有重要社会角色的人物,仅就这些事件和人物的叙述就足以构成完整的叙事框架。但作者着墨更多的是心理描写,而且绝大部分叙事是靠心理描写推动的。譬如忽大年和黄老虎这对老战友、老同事、老对手,在对其经历的大是大非、权力更替、相互支持或猜忌等进行书写时,都是通过描写各自的心理变化来展开的。再譬如忽小月从赴苏学习被遣返,到与连福秘密押运军火,再到被迫反派迫害,直至从高高的烟筒顶上飞身而下,一直是通过心理描写叙述出来的。而且这些心理描写与人物个性的特征完全吻合。作者只有完全深入到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之中,才有可能完成这样的心理描写。

在小说中,心理描写是人物的社会属性与人性本质的结合点。作者可以带领读者同时窥视人物的社会化程度和人性的深度。因此,《长安》中大量的心理描写无疑扩展了小说的视域与空间。当然,在《长安》中不是每个人都用心理描写去刻画。譬如连福,恰恰是因为很少心理描写,才使这个人物的行为和性格显得格外的诡异,才更具特异性。

如果将《长安》中形形色色的几十号人物联结起来,宏观地看他们为锻造国之重器而付出的艰苦努力,以及伴随其间个人与家庭的情感宿命,就会发现,《长安》中共和国第一代军工人的个人命运、家庭命运是与国家命运同构的。因而,《长安》首先是一部家国同构的心灵史。作为一部小说,《长安》将转瞬即逝于历史烟云的一个巨大的心灵世界,真实地记录下来。



必然逻辑,历史事实一次次证实了这一逻辑。小说也用时隐时现的另一条线,即抗美援朝中忽大年曾经所在的170师全军覆没的历史事实,反证了这一逻辑。

正是在这一历史逻辑的叙事中,阿莹在小说结尾处,将这部军工题材小说的主题,升华到了渴望和平、呼唤和平的高度:

……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想到那枚勋章应该像一只小白鸽,洁白透亮,柔和优雅,飞翔的姿态又是那么潇洒。

哎哟,那对小白鸽怎么落到眼前了……小家伙这一次,离得这么近,浑身的羽毛如同白绸,没有一丝杂乱,也没有一点尘埃,簇拥着毛茸茸的小脑袋,也簇拥着眼眶上一圈鲜嫩的红线……

四、以唯物史观与现实主义原则书写的当代国族史

如果以摄影镜头观之,小说《长安》的近景是一部由共和国第一代军工人群像构成的家国同构的心灵史,中景是一部在战争与和平语境中书写的共和国前30年的军工史,远景则是一部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国族史。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当今文艺界大量出现的历史题材的小说、舞台剧、影视剧相比,《长安》无论是历史观,还是文学观、文学叙事,都坚持了严肃、守正的立场。《长安》没有以新历史主义的史观去建构历史、虚构历史,更没有以历史虚无主义的史观去解剖历史、戏说历史,而是以唯物史观和现实主义原则与叙事策略,尽最大可能地去尊重历史的真实,去趋近历史的真实,从而以文学的方式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作为一部小说,《长安》从人物塑造到故事讲述,都严格遵循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实现了从历史真实向艺术真实的典型化过程。这一过程表明了作者直面并客观反映历史真实的唯物史观。

在小说所呈现的真实而生动的人物形象和跌宕起伏的历史故事背后,是共和国前30年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几乎涵盖了与军工相关的所有重大历史节点,而且每个历史事件都牵动了长安机械厂这个具体的军工企业 and 这组具体的人物的命运。

更重要的是,《长安》不仅以唯物史观与现实主义原则讲述了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事件及其投射到军工企业和军工人身上跌宕起伏的命运,而且进一步揭示了我们这个新兴的共和国走向改革开放,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之必然性。《长安》尽管没有展开对改革开放的具体讨论,但小说结尾处对“计划”与现实实际需求严重脱节的反思,以及忽大年从秦岭的靶场返回城里的工厂后,前途命运的未知,已经客观显现出了改革开放的必然逻辑。

与当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略有不同的,只是此时的忽大年是一位在任的“乔厂长”。同时,《长安》在战争与和平语境中对军工企业和军工人命运的书写,对整个小说“渴望和平、呼唤和平”主题的提炼,最终都揭示了中华民族走“和平崛起”之路的必然逻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长安》可以说是以唯物史观和现实主义原则书写的一部当代国族史。

《长安》是一部小说,但它蕴含了多部当代史。与历史书写不同的是,文学书写不仅富有鲜活而丰满的情感,而且是建立在历史真实之上的艺术真实,一种更加本质的真实,拥有更加打动人心魄的力量!